

# 緒 論

## 一、研究動機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從日本手上接收台灣、澎湖。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到以美國爲主的盟軍空襲破壞，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首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將台灣經濟和建設復原。但未料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由於接收人員貪污嚴重、行政長官公署用人不平等、省籍矛盾衝突，更在 1947 年 2 月 27 日爆發「緝煙血案」，隔日蔓延全台引爆全島性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雖然很快的派兵鎮壓住這一次的事件，但在同時中國大陸上國共內戰如火如荼，大陸經濟崩潰，台灣也出現了惡性膨脹。1947 年上半年物價漲 1.8 倍，1947 年下半年再漲 1.8 倍；1948 年上半年上漲 58%，下半年再漲 6.2 倍；1949 年上半年再漲 10.9 倍。<sup>1</sup>而在大陸中華民國也在 1947 年底正式行憲，隔年選出蔣中正、李宗仁爲正副總統，但此舉未能使戰事開始處於劣勢的中華民國政府有所轉機。1948 年底徐蚌會戰共軍擊潰國民黨軍隊，次年 1 月蔣中正總統宣布下野，在下野前命陳誠出任台灣省主席。中共在徐蚌會戰後不久便渡過長江，代總統李宗仁以就醫爲名赴香港。中共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也於同年 12 月遷至台北。次年 3 月蔣中正總統在台北復行視事，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最後根據地西昌淪陷，中華民國軍隊也主動撤出海南島，兩岸分治大致底定。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至台灣後，除了要面對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隨時的渡海攻擊，一方面也要穩定台灣，發展的經濟以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抗。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再度援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台灣由於有美援的挹注，經濟逐漸好轉，此後更不斷的提升台灣在 1951 年至 1991 年的年平均國民所得從新台幣 1407 增加到 219673 元，共增加了 156 倍。

---

<sup>1</sup> 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頁 32。

(表 0-1)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與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單位：新台幣元

年別	按當年價格計算				按 85 年固定價格計算 (已調整貿易條件變動損益)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		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金額	年增率(%)
1951 年	1,407	-	1,493	-	21,982	-	22,714	-
1956 年	3,296	10.29	3,502	10.75	28,277	1.46	29,205	1.81
1961 年	5,666	8.77	6,078	8.52	33,408	3.66	34,908	3.54
1966 年	8,848	9.1	9,480	9.01	46,608	6.24	48,481	6.06
1971 年	16,407	13.8	17,730	14.06	68,834	10.11	71,734	10.73
1976 年	39,559	17	43,033	17.44	94,072	12	100,274	11.41
1981 年	89,868	15.85	98,179	16.33	125,263	2.36	140,713	3.8
1986 年	137,992	15.7	151,148	15	179,176	14.28	196,140	11.34
1990 年	199,340	8.18	218,092	8.29	239,308	4.24	260,103	4.38
1991 年	219,637	10.18	240,909	10.46	254,188	6.22	276,674	6.37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考會台灣年鑑網站：

[http://www.gov.tw/EBOOKS/TWANNUAL/show\\_book.php?path=3\\_005\\_021](http://www.gov.tw/EBOOKS/TWANNUAL/show_book.php?path=3_005_021)

在這一段期間台灣經濟高度成長，專家對此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台灣這段期間高度經濟成長可說是一個「台灣奇蹟」，支持這個說法的包含美國學者高棣民 (B. Gold)、<sup>2</sup>高立夫 (R. Clough)、<sup>3</sup>台灣學者王作榮、<sup>4</sup>高希均<sup>5</sup>等人。他們大致認為「台灣奇蹟」的出現的原因有：(一) 美援妥善的運用 (二) 政府把握住正確的經濟發展策略並擬定相關政策配合 (三) 財經技術官僚的拔升 (四) 國民黨內的整合。

不過日本學者石田浩及若林正丈皆指出，台灣在戰後 40 年經濟有高度成長

<sup>2</sup> 高棣民(B. Gold)，《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觀察-台灣奇蹟》，(台北：洞察出版社，1987)。

<sup>3</sup> 高立夫(R. Clough)，《海島中國》，(台北：洞察出版社，1987)。

<sup>4</sup> 王作榮，《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台北：時報出版社，1978)。

<sup>5</sup> 高希均，《台灣經驗四十年 (1949~1989)》，(台北：天下文化，1991)。

的主因是國民黨的「開發獨裁」。<sup>6</sup>若林正丈指出國民黨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是由「反共準軍事獨裁」轉變為「開發獨裁」。主要也是形成台灣 NICS<sup>7</sup>發展的政治因素之一。用中心、周邊理論這類方式來談的話，可以說是封鎖共產主義最前線的「反共準軍事獨裁」，為了結合「中心」的資本、技術及「周邊」的低廉勞力轉換為「開發獨裁」。<sup>8</sup>石田浩認為戰後台灣高度經濟成長是因為國共內戰，國民黨兵敗退守台灣，以軍事獨裁體制來主導國家經濟的開發。因為長期實施戒嚴令這使得整個社會較為安定，所以政府可以進行經濟的開發，但在政治上民眾卻失去政治參與權。<sup>9</sup>不過若林正丈與石田浩也都認為台灣在這個高度的經濟成長中有一群財經技術官僚在負責籌畫和執行。<sup>10</sup>朱雲漢針對台灣能高度經濟成長指出，主因是國民黨的一黨威權體制，除了接收日產改組為國營或省營，銀行也全部納入公營體制，以國家的力量控制全部的金融經濟。當民間工商活動在 50 年代開始出現穩定成長，各種透過政府管制而滋生的經濟租金汲取機會隨之增加，如：進出口管制、重要農工原料配額、外匯管制、複式匯率、物價控制等，國民黨政府利用這些經濟特權做最有利於其政權的運用。並交由財經技術官僚來推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sup>11</sup>

上述學者對台灣這 40 年的高度經濟成長解讀雖然不一致，高立夫 (B. Gold)、高棣民 (R. Clough)、高希均、王作榮是肯定政府這 40 年對台灣經濟的規劃與貢獻認為這是一個經濟奇蹟。而若林正丈、石田浩、朱雲漢是跟上述 4 人不同觀點來看台灣這段高度的經濟成長的形成。若林正丈等人認為這個高經濟成

<sup>6</sup> 開發獨裁在學者的解釋中也有所不同，如：涂照彥認為的「開發獨裁」是「大眾民主主義的闕如」。在戰後美國引近日本的基礎技術與設備而加以民生應用化，接著再將用完二手技術賣給周邊 NICS 地區，NICS 地區再將這些技術生產製品對美國輸出而獲得成長，是因為能夠為確保低薪資階層存在。為了確保廉價工資階層存在，在社會上必須進行土地改革與匯率改革，在政治上則必須採取排除民眾的「開發獨裁」。谷浦孝雄認為在 NICS 所謂的「威權主義或開發獨裁政治體制」是「把國民的能量集中在經濟開發上，抑制開發初期可能引起的社會混亂（反抗）確保政治的、經濟的穩定以造成內外良好的投資環境」。

恆川惠市認為為了經濟成長、政治穩定是不可或缺的，限制參與政治體制、將獨裁加以正當化的體制。

以上引自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新自然主義，2004），頁 164-165。

<sup>7</sup> 所謂的「NICS」是新興工業國（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的英文簡稱。

<sup>8</sup>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 166。

<sup>9</sup> 石田浩，《台灣經濟の構造と展開》，（東京：大月書局，2003），頁 32。

<sup>10</sup>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 169。

石田浩，《台灣經濟の構造と展開》，頁 44。

<sup>11</sup> 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體制〉，收錄於蕭新煌編《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財團法人台灣研究基金會，1989），頁 146。

長是由於政府實施威權統治，這種經濟高度成長不是奇蹟，而是一個威權統治之下所形成的經濟產物。但無論如何，在上述學者中皆認為在這一段期間為政府內的確是有一批「財經技術官僚」在負責整個經濟發展的規劃和執行。

進行相關研究的學者都認為這一群財經技術官僚在這一段期間內扮演重要角色，無論認為台灣是經濟奇蹟或是台灣經濟發展只是黨國威權體制下的產物都特別提到這些人。解嚴後至今社會上對於這一群財經技術官僚也都是給於高度的正面評價。並在一些文章、書籍中都盛讚在領導階層拉拔下與財經技術官僚有著密切合作。尤以蔣經國主政時代台灣經濟發展達到高峰，被認為是與財經技術官僚合作無間所產生的「經濟奇蹟」。<sup>12</sup>這是否有特意凸顯兩位蔣總統的領導或財經技術官僚的功績呢？財經技術官僚在擬定與執行政策的過程是否曾有與層峰因不同意見而發生衝突？戰後台灣在黨國一體的情形下，負責財經相關事務的技術官僚又是扮演何種角色呢？財經技術官僚施政是否都一帆風順呢？本文擬以「財經技術官僚」為主軸，針對四個面向進行探討：

- 第一. 財經技術官僚如何在戰後台灣崛起，與其發展過程，出身系統。針對財經技術官僚受到拔擢入閣人員進行分析，以釐清這些人員是否有若干的人脈關係或是真的是各憑專業本事而公平受到拔擢的？
- 第二. 在兩蔣時代財經技術官僚與政治領導強人互動情形及關係為何是完全尊重專業，由專業來制訂政策，或是強人意志的貫徹，財經技術官僚成為強人意識的執行者？
- 第三. 財經技術官僚真的都是如同過去報章雜誌所言是一個合作無間的整體嗎？在其內部相互關係為何？完全都沒有官場上的競爭的關係嗎？
- 第四. 在黨國一體情形下財經技術官僚與國民黨的關係為何，是否為以黨為核心的領導，政策上以黨領政或是財經技術官僚具有財經主導權不受黨節制？財經技術官僚在黨內的地位演變以及曾受到的挑戰、打擊進行探討。

---

<sup>12</sup> 羅浩，〈主導三十年經濟的強人-創造台灣奇蹟的財經決策人物〉，收錄《財經決策強人 中華民國經濟的領航者》，（台北：財經人雜誌社，1984），頁 44。

在財經技術官僚定義上技術官僚理論是起源自希臘時代思想家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學家皇帝概念，以菁英治國為其論基。<sup>13</sup>近世西方提出技術官僚理論的則是聖西門（Henri Saint Simon），他認為藉由科技人才組成的政府機構，能夠「用最有效的方法以最小的花費來達到最大的效果」。<sup>14</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William Henry Smyth 首度使用「技術官僚制」（technocracy）一詞，當初推動技術官僚制運動是為了消除 1930 年代早期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經濟崩潰。<sup>15</sup>西方典型的技術官僚理論認為技術官僚是屬於無政治的意識型態（apolitical ideology），此種說法後來遭受以研究共主義官僚制的學者質疑，認為技術官僚並非完全無意識型態的專家，而是政治型專家（politician-specialists）。<sup>16</sup>鄭為元在〈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一文中提到發展型國家自主來源有三：（一）威權（二）法治（三）官員能力，其中在官員能力這點上提到「財經官僚」（政務官）等同技術官僚的疑問。鄭氏認為財經官僚應與技術官僚脫勾，他認為過去會將財經官員歸類為「技術官僚」，是因為要與掌握國家實權的「軍特領袖」做區分。他以李國鼎與葉萬安為例：李國鼎是物理系畢業並非經濟相關系所，因此理通曉的經濟學應屬「通識」而非「技術」。鄭氏並以當時台灣是處於計畫經濟體制下，許多計畫都是美國經濟顧問和美國顧問公司所規劃。故經濟設計雖然是技術，但經濟決策需要的是「膽識」而非「技術」。因此在鄭氏的分類裡李國鼎屬於的是屬於決策的「財經官僚」，而葉萬安才是屬於幕僚、規劃性質的「技術官僚」。<sup>17</sup>陳思宇在《台灣區生產管理事業委員會經濟發展策略（1949-1953）-以公營事業為中心的探討》一書中同意鄭為元的看法。陳氏以台灣區生產管理委員會為例，在生管會職權日漸擴大由督導、聯繫各生產事業的經營管理工作，轉而開始統籌各項財經決策，組織權力向常委會與若干工作小組集中，部分委員由單純技術官僚轉而成財經決策者，而其他技術官僚則成為公營事業主管與政策執行者。<sup>18</sup>本文不就技術官僚理論進行探討，本文所提之財經技術官僚是中華民國

<sup>13</sup> Frank Fischer, *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1990, p.67.

<sup>14</sup> Jean Meynaud, *Techn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12-13.

<sup>15</sup> 張鈞智，《中共政治領導菁英之研究-技術官僚制的興起與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30。

<sup>16</sup> 張鈞智，《中共政治領導菁英之研究-技術官僚制的興起與影響》，頁 36。

<sup>17</sup> 鄭為元，〈發展型「國家」或發展型國家「理論」的終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4 期，1999.6 頁 27。

<sup>18</sup> 陳思宇，《台灣區生產管理事業委員會經濟發展策略（1949-1953）-以公營事業為中心的探討》，（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2002），頁 113。

遷台之後中央財經單位（財政部、經濟部、中央銀行、財經審議機構）等具有實際決策、執行單位為範疇。其單位主要負責人非軍事人員或強烈政治意識型態者，且具財經、理工等類的學歷背景者為主要探討對象。

本研究的時間斷代是以 1950 年蔣中正總統在台灣復行視事至 1988 年蔣經國總統逝世，這長達近四十年期間處於一個黨國強人威權領導下的台灣對於財經技術官僚的任用有相當大的影響，故本文以此為文中時間的斷代。

## 二、研究回顧

有關「財經技術官僚」的學術研究，至目前為止大多是以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個別人物、戰後財經決策和經濟計畫決策機關為主。缺乏對於「財經技術官僚」這個群體進行單獨的研究。

### （一）總體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研究

在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有前述的王作榮《我們如何創造了-經濟奇蹟》、高立夫(R. Clough)《海島中國》、高棣民(B. Gold)《從國家與社會的角度觀察-台灣奇蹟》、高希均《台灣經驗四十年(1949~1989)》等書是說明並肯定台灣的經濟高度成長是一個奇蹟。石田浩《台灣經濟の構造と展開》、若林正文《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體制〉等書主要是認為台灣高度經濟成長是黨國威權體制下的產物並不是一個奇蹟。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則是以戰後台灣經濟在政府官方資本與民間資本的累積進行描述，並對官商資本結構與運動進行討論。<sup>19</sup>段承璞《台灣戰後經濟》也是對戰後台灣經濟資本的問題進行探討，但與劉不同的是段著重於國內資本形成與外來資本，包含外國資本與僑資對戰後台灣經濟的發展。<sup>20</sup>這兩本書較以左派的觀點來批判國民黨黨國資本的形成。除了上述著作外另有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林著中是以概略性的方式來描述這四十年來台灣經濟的發展，書中並沒有針對特定主題進行深究。<sup>21</sup>此外也有學者運用「唯國家論」與「依附理論」來探討戰後台灣經濟問題。

Denis Simon 以唯國家論 (statism) 的觀點來看台灣這段經濟發展，在其博

<sup>19</sup> 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

<sup>20</sup> 段承璞，《台灣戰後經濟》，(台北：人間出版社，1994)。

<sup>21</sup> 林鐘雄，《台灣經濟發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

士論文 *Taiwa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nationalism :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Dependency*.<sup>22</sup>討論國家與跨國公司關係，台灣為何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同，如一樣是出口導向經濟，在大部分的第三世界社會導致矮化發展，但台灣確有顯而易見的工業化，在第三世界社會的經濟為跨國公司掌控，台灣則無，別的地方導致貧富懸殊，台灣則趨於平均。<sup>23</sup>因此 Simon 對台灣經濟高度發展的闡述，在政府對跨國企業採取了技術轉移政策，以國家強制的力量來做經濟發展。Simon 認為如果要舉一個台灣最重要而特殊的經驗，那就是它擁有一群能力很強的技術官僚，他們有效運用外來的本地的資源，以服務於本地人民在發展上的需要。<sup>24</sup>

陳玉璽在《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利用「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來說明台灣在戰後為何可以經濟高度發展。從過去與日本帝國的依附關係到戰後與美國新的依附關係。在 1950~1965 年對台灣實施經濟援助與技術援助使台灣依附美國而發展。在這依附關係下產生三種宰制、內部及互補性的整合：

1. 宰制功能：國際開發總署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要它改變抑制公營企業政策，鼓勵私營部門發展，並促使它實行一系列行政改革，特別是有關對外貿與投資的行政改革。<sup>25</sup>
2. 內化過程：美援會是在行政院領導下負責管理美援基金運用的部際機構，但它受國際開發總署的政治操作與財務控制，美援會不受國民黨政府任何公務員法規約束，它能出高薪招聘能力高超的職員。因此 1950 年陳誠當上行政院長不久，在陳誠周圍以美援會內部便形成一個由有改革思想的技術專家組成的核心。在這批人的影響下，這位軍人出身的政治人物似乎很快就有了一種明顯背離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傳統的「經濟發展思路」。<sup>26</sup>

<sup>22</sup> Denis Simon, *Taiwa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Dependenc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0.

<sup>23</sup> 王振寰，〈國家角色、依賴發展與階級關係-從四本有關台灣發展的研究談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88，頁 120。

<sup>24</sup> Denis Simon, *Taiwa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nsnationalism: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Dependency*, p.169 .

<sup>25</sup> 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台北：人間出版社，1995），頁 70。

<sup>26</sup> 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頁 77-78。

3. 互補性整合：60年代中期，美國逐漸結束台灣的援助，台灣經濟同時逐漸進入「出口導向」時期。靠的是利用美援計畫改善社會及經濟基礎設施，對國民黨政府官僚直接和間接施加壓力，以及使一系列替國際開發總署履行各種職能的合作機構內化。國際開發總署朝著這個方向致力改造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致使形成十九點改革綱領、外匯改革和進口貿易自由化。<sup>27</sup>

這些研究成果可提供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概況，以不同的角度來探討。本文希藉此更瞭解戰後台灣經濟的面貌。

## (二) 財經政策研究

在財經官員參與的決策的相關學術研究以美援運用的研究為最多，主要是美援對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使當時財政困頓的中華民國政府獲得建設的經費，其相關研究有：

美援部分：

Jacoby, Neil Herman. 在 1966 年所著的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sup>28</sup> 是早期研究美援重要的著作，其立論強調美援對台灣經濟、工業發展有非常大的助益。他認為如果沒有美援，據計算台灣國民生產總值在 1983 年之前每年可能只會增長 3.5%，美援使達到 1964 年生活水準所需時間縮短了 30 年。<sup>29</sup>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以大量數據與圖表來說明美援時期政府如何運用到這些美援來投入國家建設。<sup>30</sup>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sup>31</sup>文中立論是破解台灣是美援模範的迷思。在冷戰大環境下，援台物資中非軍事的贈與少、軍援多、非計畫型多，因此她認為一般對美援的研究都片面強調經援的重要

<sup>27</sup> 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頁 82。

<sup>28</sup> Jacoby, Neil Herman. *U.S. Aid to Taiwan :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sup>29</sup> Jacoby, Neil Herman. *U.S. Aid to Taiwan :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p.152.

<sup>30</sup>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台北：聯經出版社，1985）。

<sup>31</sup>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0）。



性，往往也誤將計畫型經援有效運用，視為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對台經援計畫型與非計畫型的比例為 3：7。美國援台以非計畫性援助為主，是在軍事模式下安定政經目標所致，並非是以發展台灣經濟為首要目標。<sup>32</sup>在這影響下雖然鞏固了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但也強化了美國對於台灣的控制。在這複雜的政經情勢下，因此不可說台灣是美援成功的典範。

林炳炎《保衛大台灣的美援（1949～1957）》，<sup>33</sup>他認為國民黨政府能在來台灣後迅速的穩定，美援是很重要的部分。他批判過去研究都將美援之所以可以成功運用是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人規劃及妥善運用。他提出了當時在台灣擔任美援顧問的美國懷特工程公司（J.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和該公司的計畫經理狄卜賽（V.S.de Beausset）才是台灣在規劃、運用美援來作工業建設最重要的推手，反駁過去將尹仲容等技術官僚做為台灣經濟高度發展背後的推手。

邱金專《五十年代美援政策的運用－共同安全計劃之發展》；<sup>34</sup>簡美雲《由『相互依存』概念檢視美援時期之中美關係》；<sup>35</sup>陳麗珠《從台銀與美援資金分配探討公民營事業之發展（1945-1965）》；<sup>36</sup>安後暉《美援對台灣職業教育的影響（民國三十九－五十四年）》；<sup>37</sup>鍾瀚樞《1950 年代台灣的美援教育計畫》。<sup>38</sup>這幾篇皆是以美援對單一政策或單位的研究。

也有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一段期間台灣的經濟發展，主要有蕭全政、周育仁等人。

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一書中〈台灣地區支持性米價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特別提到美援穀物對台灣政經情勢的影響，並探討至美援時期到美援結束後，穀物進口對支持性米價政策的變遷。<sup>39</sup>

<sup>32</sup> 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頁 269。

<sup>33</sup> 林炳炎，《保衛大台灣的美援（1949～1957）》，（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資料中心，2004）。

<sup>34</sup> 邱金專，《五十年代美援政策的運用－共同安全計劃之發展》，（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sup>35</sup> 簡美雲，《由『相互依存』概念檢視美援時期之中美關係》，（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sup>36</sup> 陳麗珠，《從台銀與美援資金分配探討公民營事業之發展（1945-1965）》，（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sup>37</sup> 安後暉，《美援對台灣職業教育的影響（民國三十九－五十四年）》，（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sup>38</sup> 鍾瀚樞，《1950 年代台灣的美援教育計畫》，（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sup>39</sup> 蕭全政，〈台灣地區支持性米價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1988），頁 119~161。

周育仁《政治與經濟之關係-台灣經驗與其理論意涵》在書中的第三章就是以國家組合主義與台灣政經關係，對於戰後台灣國家機關如何制訂政策來引導經濟發展，藉以說明在「計畫自由經濟」體制下政治與經濟的關係。<sup>40</sup>這類研究成果可讓本文更加瞭解財經技術官僚與這些財經政策制訂的關係。而用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下去探討，可以瞭解國家、財經政策、官員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 （三）財經技術官僚個人的研究

除了個人傳記、回憶錄、口述歷史外，其他相關著作有張駿《創造經濟奇蹟的人》，主要是概略介紹與台灣經濟奇蹟有相關的財經技術官僚，包含尹仲容、嚴家淦、俞鴻鈞、徐柏園、張茲闓、李國鼎、孫運璿等人。<sup>41</sup>

學術論文上有劉榕樺《尹仲容與台灣工業化（1949~1963）》、<sup>42</sup>黃子華《尹仲容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sup>43</sup>宿金璽《尹仲容與戰後台灣經濟發展》。<sup>44</sup>尹仲容在台灣經濟發展時期幾乎都擔任財經計畫機關的主要負責人，這三篇論文主要是以尹仲容為主軸探討他對台灣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研究他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的制訂。

吳宏志《李國鼎對台灣經濟發展之政策影響力》、<sup>45</sup>周明正《李國鼎與台灣科技發展初探》。<sup>46</sup>李國鼎則是在尹仲容過世後成為台灣經濟計畫機構的實際負責人，之後入閣先後擔任經濟部長與財政部長，在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時出任科技小組召集人，對於台灣科技產業的發展有著很大的關係。這兩篇論文主要是以李國鼎為主軸，吳著是探討其對整個台灣經濟發展在政策規劃、制訂時所扮演的角色；周著則是單以李國鼎對台灣科技發展方面進行探討。

另外也有對中華民國政治菁英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有：彭懷恩《中華民國的政治菁英-行政院會議成員分析（1950~1985）》，文中是以在1950~1985期間參與行政院會議的成員，文中稱呼他們為內閣菁英，從當中研究我國政治菁英的社

<sup>40</sup> 周育仁，《政治與經濟之關係-台灣經驗與其理論意涵》，（台北：五南出版社，1995）。

<sup>41</sup> 張駿，《創造經濟奇蹟的人》，（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

<sup>42</sup> 劉榕樺，《尹仲容與台灣工業化（1949~1963）》，（台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sup>43</sup> 黃子華，《尹仲容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思想》，（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sup>44</sup> 宿金璽，《尹仲容與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sup>45</sup> 吳宏志，《李國鼎對台灣經濟發展之政策影響力》，（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sup>46</sup> 周明正，《李國鼎與台灣科技發展初探》，（台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會背景、甄補管道、菁英整合等作為全盤政治菁英研究基礎。<sup>47</sup>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1950~1975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委員為例》，該文比較中華民國到台灣與中國歷代流徙政權，探討中華民國到台灣如何讓當地民眾接受，以蔣介石時代黨國政治菁英的特質來做說明。<sup>48</sup>這兩篇論文雖然主要是探討中華民國及國民黨內政治菁英，但不乏有提到相關的財經技術官僚，對於瞭解在兩蔣時代的中央政治菁英可更進一步瞭解。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中的在威權鞏固時期的政治派系章節中提到國民黨來台灣之後建立了雙重派系結構，蔣中正來台灣之後如何以新的財經技術官僚來取代過去在大陸掌握財經大權的孔宋集團及政學系等。<sup>49</sup>

#### （四）財經計畫機構的研究

在戰後台灣相關的財經計畫機構包含在中國大陸時期就成立的資源委員會（以下簡稱資委會）、1949年之後在台灣成立的包含有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生管會）、行政經濟安定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安會）、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以下簡稱美援會）等。在相關的研究中資源委員會偏重於在大陸時期的貢獻，包括有鄭友揆等，《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薛月順，《資源委員會的電業建設（民國二十一年-三十八年）》。<sup>50</sup>有關台灣的部分有薛月順〈資源委員會與戰後台灣公營事業的建立〉<sup>51</sup>、程玉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資源委員會〉、<sup>52</sup>程玉鳳《資源委員會與

<sup>47</sup> 彭懷恩，《中華民國的政治菁英-行政院會議成員分析（1950~198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sup>48</sup> 李功勤，《蔣介石台灣時代的政治菁英（1950~1975年）-以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及內閣委員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sup>49</sup>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新自然主義，1995）。

<sup>50</sup> 有關資委會在中國大陸時期的相關研究計有：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商經濟組，《回憶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鄭友揆等，《舊中國的資源委員會（1932~1949）-史實與評價》，（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林蘭芳，《資源委員會的特種鑛產統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薛月順，《資源委員會的電業建設（民國二十一年-三十八年）》，（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sup>51</sup> 薛月順，〈資源委員會與戰後台灣公營事業的建立〉，收錄於《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 第三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6），頁 1123~1149。

<sup>52</sup> 程玉鳳，〈一九四九年前後的資源委員會〉，收錄於胡健國編《一九四九：中國關鍵年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頁 411~447。

台灣糖業-1945~1952》。<sup>53</sup>薛著是探討戰後資委會針對台灣接收日產如何演變成公營事業進行討論。程玉鳳所著的論文，除一篇是以資委會對於台灣糖業的接收、經營的研究，另一篇則是以資委會在 1949 年遷台前後的演變，來台灣後的資委會功能與生管會職權重疊甚多，而其主要人員在中國大陸時大多投共，說明遷台之後如何沒落被裁併。

生管會的相關研究有：陳思宇《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略(1949-1953)-以公營事業為中心的探討》、<sup>54</sup>孟祥瀚《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政府遷台初期的經濟發展,1949-1953》。<sup>55</sup>陳著則是以生管會在成立之後對於公營事業的整頓，並對於策略性產業的決策包含電力、肥料、糖等對戰後台灣影響最大的三項公營事業。孟著著重在生管會對於戰後台灣經濟發展上的影響，分為二個方面，一以在經濟政策的決策機制上，生管會以絕對之優勢主導經濟發展之走向，其內部多方諮商，少數決策的模式，未來成為日後台灣經濟決策上的特色。二探討以台灣的經濟自光復之初百業凋敝透過整頓公營事業增加生產，認為利用匯率與外貿政策維持金融穩定，選擇策略性產業等方式，不僅穩定經濟頹勢，為日後經濟快速之發展奠下基礎。另有一篇較概論性的，張駿〈台灣經濟起飛與繁榮的奠基者「生管會」〉介紹生管會其對台灣經濟的影響。<sup>56</sup>

經安會的相關研究有李君星《經安會與台灣工業的發展（民國四十二～四十七年）》，這一篇是第一篇以經安會撰寫的學位論文，運用大量經安會檔案。其重點在討論經安會如何推動四年經建計畫，並與民營工商業者關係為何；並說明經安會與台灣工業發展的關係，並比較國內外類似的經濟設計審議機構。<sup>57</sup>陳怡如《行政革新與台灣財經組織之變遷（民國四十二～四十七年）》，則是以戰後政府來台之後，曾仿效美國的「胡佛委員會」，以黃季陸與王雲五分別成立行政革新委員會，文中以行政革新委員會對中央財經組織變遷進行說明，所包含的範疇有

<sup>53</sup> 程玉鳳，《資源委員會與台灣糖業-1945~1952》，（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sup>54</sup> 陳思宇，《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略(1949-1953)-以公營事業為中心的探討》。

<sup>55</sup> 孟祥瀚，《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與政府遷台初期的經濟發展,1949-1953》，（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sup>56</sup> 張駿，〈台灣經濟起飛與繁榮的奠基者「生管會」〉，《傳記文學》第 45 卷第 6 期，1984.12，頁 10~14。

<sup>57</sup> 李君星，《經安會與台灣工業的發展（民國四十二～四十七年）》，（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美援會、經安會與外貿會。而其時間的斷代是以經安會從成立到結束。<sup>58</sup>至於美援會則無相關論文對其組織或運作做專論性探討，大多是以前述美援運用的部分為主。這一些相關研究可幫助本文對戰後台灣經濟計畫決策機關的相關瞭解及其對經濟發展時期其運作、決策模式並與財經技術官僚的關係。

唐齊民《我國經濟設計機構發展之研究》<sup>59</sup>是早期探討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灣之後，政府如何運用經濟設計機關來規劃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文中從 1954 年所成立經濟安定委員會為起始點探討至 1973 年所以成立的經濟設計委員會為止。

巫永平在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tate Survival,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Economy, 1950-1985*<sup>60</sup> 一書中以「政治權力運作」為中心架構認為台灣過去經濟計畫機構是受美援、官僚政治、政治強人意志等政治因素而頻繁改組。巫永平認為以美援單位而成的技術官僚是在陳誠的支持下所形成，並在 1960 年代與主持經濟、財政機構的「官邸派官僚」產生摩擦而形成派系鬥爭。因此書中對於經濟計畫機構更迭頻繁是以官僚派系鬥爭的觀點進行闡述。藉透過各機構之研究指出其特點，而本文可借重、啟發。

### 三、史料運用

本文將運用史料將有官方檔案、傳記、回憶錄、報紙期刊等資料。主要使用的官方檔案計有：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石叟叢書》，《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與《石叟叢書》，都是當時國家主要領導者的相關檔案，對於財經技術官僚及其政策應多有指示和討論，故藉其檔案可瞭解技術官僚與高層領導人的關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所藏有《生管會檔案》、《經安會檔案》、《美

<sup>58</sup> 陳怡如，《行政革新與台灣財經組織之變遷（民國四十二～四十七年）》，（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sup>59</sup> 唐齊民，《我國經濟設計機構發展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

<sup>60</sup> Wu, Yongping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tate Survival,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Economy, 1950-19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援會檔案》、《李國鼎先生檔案》。《生管會檔案》、《經安會檔案》、《美援會檔案》可對於文中在財經決策機構進行深入的探討。《李國鼎先生檔案》收羅更是豐富，其中包含李國鼎先生從早期經安會時代到晚期擔任科技小組召集人，李國鼎相關資料皆有收錄，另還有其對黨務參與的相關資料，透過《李國鼎先生檔案》可更瞭解財經技術官僚運作模式，並可補計畫機關檔案不足的地方。

《國民黨檔案》現藏國民黨黨史館，本文擬用國民黨中常會會議記錄作為黨政關係部分的研究。

財經技術官僚成員有若干回憶錄、口述歷史，此為論文中重要資料來源，可補史料上不足之處，相對照史料的以更瞭解其真實性。



(表 0-2) 本文將採用財經技術官僚相關人士的傳記、回憶錄、口述歷史：

書名	撰寫對象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尹仲容	沈雲龍	傳記文學	1972
浮生百記	錢昌祚	錢昌祚	傳記文學	1975
俞鴻鈞傳	俞鴻鈞	王紹齋	聖文	1986
財經生涯五十年：趙既昌憶往	趙既昌	趙既昌	商周	1994
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台灣經驗	李國鼎	康綠島	卓越文化	1993
李國鼎：我的台灣經驗：李國鼎談台灣財經決策的制定與思考	李國鼎	劉素芬	遠流	2005
孫運璿傳	孫運璿	楊艾俐	天下	1989
財經巨擘：俞國華生涯行腳	俞國華	王駿	商智文化	1999
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周宏濤	汪士淳	天下	2002
石油一生：李達海回憶錄	李達海	鄧潔華	天下	1995
平凡的勇者	趙耀東	趙耀東	天下	1991
鐵頭風雲：趙耀東傳奇	趙耀東	劉玉珍	聯經	1995
中鋼推手：趙耀東先生口述歷史	趙耀東	張守真 陳念南	高雄市 文獻會	2001
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	汪彝定	汪彝定	商周	1991
韋永寧先生訪談錄	韋永寧	程玉鳳等	國史館	1994
王昭明回憶錄	王昭明	王昭明	時報	1995
壯志未酬：王作榮自傳	王作榮	王作榮	天下	1999

由筆者自行整理自製

本文也將運用期刊報紙以對當時情況更加深入瞭解，如：《中央日報》、《聯合報》等。

## 四、論文結構

章節編排除緒論、結論外，共分六章進行探討。

第一章探討威權時期台灣的政治經濟背景，內在條件在於國民黨來台後進行黨改造，加上實施戒嚴法、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抑制人民若干參政的自由，使得政治呈現「安定」狀態。外在條件則因美援的援助，不但使台灣經濟穩定，技術官僚參與美援單位重要性日趨提高。

第二章探討戰後台灣財經決策機構的演變。從播遷時經濟的混亂到安定，除了美援的運用外，相當長的時間體制外的財經決策單位取代體制內的財經部會成為實際的運用美援、擬定工業財經計畫的機構。

第三章探討技術官僚與執政者的關係，其中以陳誠與蔣經國兩位有實權行政院長與財經技術官僚關係最為緊密，本章將探討這兩位行政院長運用財經技術官僚的背景與其意義。

第四章討以財經技術官僚與國民黨的關係進行探討，對於黨務的參與，以及黨對其的教育訓練進行分析。

第五章戰後財經技術官僚的出身背景分析與特性。

第六章探討財經技術官僚的在施政上所遭遇到的頓挫。

## 五、預期成果與限制

本文是對戰後台灣的財經技術官僚進行研究，用歷史學的角度其成果希望能藉此讓大家對財經技術官僚的地位演變、權力關係有更一步的瞭解。在黨國威權體制下財經技術官僚與政治強人的相處關係；財經技術官僚內部人員關係；財經技術官僚與國民黨內的關係將會有進一步的研究成果以釐清財經技術官僚在戰後台灣權力架構下所扮演的角色。尋此脈絡可以更加瞭解財經技術官僚的歷史定位，及對於為來的研究者有一個不同面向解讀財經技術官僚。

不過本文能會有一些研究限制，如許多財經技術官僚雖然有出版傳記、口述歷史，但在運用這些資料不免會受到一些侷限，例如：受訪者有時會受限於記憶或刻意選擇說出對自己比較有利的話，對於自己較不利的說法就會省略或簡單帶過。大部分個人日記也未公開，少了可以直接使用的史料。因此只能藉財經技術



官僚的傳記、回憶錄、口述歷史與官方檔案或其他資料來做比較以辨其真實性。故此為本文撰寫中的研究限制。針對於此本文在採用口述歷史、回憶錄的同時需搭配檔案資料或不同人物的口述歷史、回憶錄還互相對照其真實性。

